

引 言

对“文化”一词的内涵历来众说纷纭，各国学者所做的解释近200种之多，想给其下一个定义殊非易事。在我国典籍中，“文化”这个概念最早见诸《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代孔颖达注释“人文化成”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像《诗》、《书》这样的文化典籍和礼乐这样的礼仪制度，其二是说当按照上述典籍所言和礼仪制度教化天下。至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始用“文化”一词：“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仍是指的教化。在西方诸国的语言中，“文化”一词则都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本义为“耕作”、“培育”、“敬拜神明”。这说明，无论中外，“文化”之概念，最初均与人的有目的的精神创造活动相关。

19世纪末期，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通过国人从日文转译的西方著作进入我国。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出版的名著《原始文化》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在东西方都曾风靡一时：“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

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其后，西方学者曾从不同的知识领域和角度提出了各种对“文化”的界定。例如：“文化”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人们为达到其目的而使用的技术、机械、智力和精神的综合(斯莫尔)；一个群体的“文化”是指这一群体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而这些社会遗传结构又因这一群体特定的历史生活和种族特点而获得其社会意义(帕克和伯吉斯)；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被称作“文化”，它包括所有标准化的社会传统行为。部落文化是该部落的人所遵循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行为的总和(威勒斯)；“文化”是一个反应行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习惯模式系统(威利)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尔后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亨廷顿)等等。

在我国，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是近 20 年来的事情，学者们对文化的一般理解似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常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则被认为专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近年来，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衍生意义日益丰富，许多新的词汇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之中，如“企业文化”、“旅游文化”、“校园文化”、“网络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等，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的确，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有意识和目的的创造性活动的物化结晶以及传承性是文化概念中的两个核心要素，那么“文化”一词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复杂化不断丰富就是必然的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应该是人类各个时期所创造的物化的精神形态和精神化的物质标志。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上述诸方面，也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主体，而其他方

面的支系则属于受到主体文化影响的、易变的“亚文化”。

众所周知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必然反映，但是社会意识和文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常常表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发展规律，一些人类早期所创造的文化成果跨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伴随着人类由最初的分散生活、到彼此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也常常跨越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对各个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创新和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不仅在经济文化联系密不可分的今天是如此，即使在遥远的古代也是如此。

近代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奠基于西方的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1694—1778) 的《路易十四的时代》和《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的问世，标志着文化史研究的开始。此后，文化史研究的著作大量涌现，如法国历史学家基佐 (1787—1874) 的《欧洲文明史》、《法国革命史》 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巴克 (1821—1862) 的《英国文明史》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 (1818—1897) 的《希腊文化史》、《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名著。到 19 世纪，学者们对文化史的综合性和文化理论的探讨得到进一步加强。1838 年 德国学者 L. 皮格亨提出了“文化学”的概念，认为文化学应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43 和 1854 年 德国学者 C. E. 克莱姆推出了《普通文化史》和《普通文化学》两书。随后，主要研究人类社会行为方式、习俗信仰、集体意识和社会组织的文化人类学在西方兴起，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进入 20 世纪，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文化学理论也更趋成熟。世界不同地区文化的模式、结构，文化的传播方式以及文化的转型机制等重要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比较文化学研究成为东西方文

化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学者斯宾格勒 1880—1936 出版了名著《西方的没落》将世界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成体系的文明区分为八种文化形态，从而提出了“文化形态史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则在其影响广泛的 10 卷本巨著《历史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而美国学者爱德华·M·伯恩斯与菲利普·L·拉尔夫共同撰写的《世界文明史》，则以丰富的资料和宏大的结构，论述了从史前时期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文化学研究在西方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果实。

外国文化史方面的著作和教材近些年来在我国不断涌现，既有将东西方文化一同考察的世界文化史和外国文化史，也有将二者分开探讨的东方文化史和西方文化史。这些著作详略有异，风格不同，各有特点，体现了编写者对东西方文化本身以及文化史编写原则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对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考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文化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文化本身牵涉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哪些部分应该纳入文化史的重点考察视野之中是颇费思量的问题，依据不同的文化学理论写出的文化史，面貌也必然有所不同。本书则是为适应开设一学期的西方文化史课程而编写的一部教材。既然名为“西方文化简史”，当然就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谈到西方文化的所有方面，而只是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述及西方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成就。线索清晰、重点突出是本书的一个原则。为使整个结构完整，同时也考虑到古代西亚北非文化对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影响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特意增加了第一、第二两章的内容。了解西方文化史，可以为我们认识世界，参与世界事务打开一扇窗口，也是我们从以往的人类文化创造中汲取精华，总结教训的重要途径，更是我们在新的世纪建设新文化的必然要

求，这在今天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本书的第十章就是关于这方面问题的一些思考。

从开始编写此书，到最后定稿，都体现了各位作者精诚合作的精神。本书的章节结构、体例是由我来确定的，具体内容的撰写则有劳于朱耀良、张丽、刘燕和王旭峰四位同志。具体分工为：第一、第二章，刘燕；第四、第五章，朱耀良；第六、第七、第八章，张丽；第三、第九、第十章，王旭峰。初稿完成后，由我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改毕后再由我统稿并做了最后的修订工作。由于篇幅的限制，加之时间仓促，本书的粗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提出宝贵意见。

主 编

2004 年 11 月

第一章 人类的起源与原始文化

如果把全部人类文明看做一棵大树 那么这棵树成长到今天 已经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衍生出一片片的丛林了。文明的种子是怎样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呢？一定要寻根探底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它史前的源头中去。

考古学证实 人类全部的历史不过 200 万年，而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时期就占据了人类发展史的 95%。如果把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总共视为一小时的话，我们能够确证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是最后三分钟内的事情。在漫长的原始时代中，人类不仅完成了从动物到人的生物上的进化过程，而且不断地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开创了人类文化的源头。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创造、发展了伟大的远古文化，点燃了人类的智慧之火，奠定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坚实根基。这些来自遥远蒙昧时代的智慧之光，看似微弱，却穿透厚重的时空帷幕，将文明最初的火种撒向人间。因为有了这一点星星之火，人类文化才得以生生不息地蔓延开去。

一件略经打磨的砾石，一片粗糙的陶片，一块钻孔的兽骨 每一件简单的发明、发现都刻录着文化的印痕。沧桑的岁月斑驳了记忆

的小径，我们只能凭借这些沉睡在地层之中的文化的碎片，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神秘的原始森林中去，寻访人类迈向文明的第一步足迹。

第一节 人类的起源与原始文化

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伟大星球——地球，至少在 46 亿年前就已经在不停地旋转、运动着了。大约在 30 亿年前或更早些时候，最早的生命才在地球上诞生，它不过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其后，历经数亿年漫长的进化，在各种植物、动物一茬一茬地生存或灭绝之后，人类的祖先，终于在几百万年前登上生命的舞台。尽管论资排辈，人类充其量不过是生命家族中的小字辈，但却以智慧的头脑和强韧的适应力脱颖而出，迅速遍及地球上除南极洲之外的各个角落，成为万物之长。不过，无论人类多么强悍，面对浩瀚宇宙，苍茫天地，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粟；而几百万年的历史，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人类究竟是从何而来？人类的祖先是什么样子的？人类起源的真相被时空的黑洞所吞噬，成了争论不休的谜题，这对于地球的主宰者人类来说，的确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神创论 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圣经》所记载的上帝造人说，在千余年内曾被人们奉为真理。《创世纪》里说，上帝造日月、天地、植物、鸟兽，在第六日，照着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了亚当。后来又取出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他的配偶夏娃。人类的始祖就这样诞生在神的手中。类似的说法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可以找到。比如，在中国有女娲用黄土造人的故事；在古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用黏土捏成人。这些传说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观念：人是神用土造的。神创论体现了宗教神学对人类起源的理解。透过其荒诞的外表，我们可以窥到尚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祖先对自身起源问题朴素而极富

想像力的解释。

科学假说 随着考古学、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等多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关于人类的身世之谜渐渐露出一些端倪，出现了以科学为依据的大胆假说。法国杰出的生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首先提出了有关类人猿的某些观点。1809年在其名著《动物哲学》中，他断言，动物之间存在着亲族关系，而高级动物是从低级动物形态中发展而来，最初的人类便是由“类人猿”演化而来的。这种革命性的提法，深深撼动了神创论的根基。不过，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这位预言家并没有进一步阐发他的观点，也没有可靠详实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推断。

50年后，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沿着拉马克的足迹走得更远。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后横扫以前一切有关人类起源的种种谬论和神话，无异于一枚炸弹，将神创论的美丽传说炸得粉碎。在书中，达尔文用大量动植物演变的科学资料，揭示了生物进化的规律。1871年在另一巨著《人类的由来及其性的选择》中，他进一步论证了人类的祖先是类人猿。生物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完美结合，使进化论具有了无可辩驳的力量。

19世纪下半叶 汤姆斯·H.赫胥黎（1825—1895）的人猿同族论和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一文都充实完善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尤其是后者，更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类起源和人类社会产生的规律，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理论。

今天 遗传基因学等新兴学科的新成果进一步验证和修正了人类与猿的关系，再也没有人会讥笑科学家们是“猴子”了。人由猿进化而来这一观点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虽然面对生命的起源，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还有许多不解之谜，但是，新的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发现，使人类最终还原生命演化的完整链条成为可

能，人们正在一步步接近百万年前的真相。

人类的前身 大约在 1 500 万年之前，地球的气候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也就是 3 500 万年前到 2 500 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的渐新世时期，气候温暖而潮湿，地球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目前所知最早的古猿——埃及的原上猿（约 3 500 万—3 000 万年前）还有埃及古猿（约 2 800 万年前）森林古猿（约 2 500 万—1 000 万年前）渐次在茂密的雨林里繁衍生息。这些‘攀树的猿群’^①成群生活在树上，灵活地在丛林中跳跃腾挪。

但是，在第三纪的中新世，又一个冰河期来到了，地球气候渐渐变得四季分明，雨林开始退化、稀疏，林栖的猿类必须走向草原。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古猿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毁灭？

腊玛古猿 第一批成功脱离雨林并适应了热带草原生活的是腊玛古猿。在 1 400 万年前的某一天，它们小心翼翼地从天上来到地面，警惕地注视着陆地上的一切。从树上迈向陆地的一小步，其伟大意义决不亚于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那一步。没有这关键性的一步，人类至今也许还与其它猿类一样，生活在树上呢。

走出树林的腊玛古猿，迅速地拓展了自己的生活天地。1932 年，它们的化石在印度北部的西瓦立克山地首次出现，以后从西班牙到中国的广大地域中都发现了它们的足迹。它们身材短小，不高于 120 厘米。然而这些小家伙们已经能够使用石块、木棒等天然的工具，在地面觅食。腊玛古猿吻部突出，犬齿退化不突出，臼齿齿冠很厚。牙齿排列较密，有着耐磨损的釉质层。这样，它们的下颚可以自由地做左右侧向的运动，并能在强化了了的臼齿间咀嚼食物。这表明它们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以热带多汁水果为主食，而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里，提出了“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三组概念。

是以坚硬的草籽和秕谷为食。从解剖学特征看，腊玛古猿反映出由猿向人过渡的趋势。

大约在 800 万年前 腊玛古猿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 到南方古猿出现前的几百万年的时期里 除了在非洲、亚洲发现了 5 颗类人猿牙齿化石外，没有发现猿类任何的踪迹。

美丽的“露茜”腊玛古猿之后出现了南方古猿，大概生活在 500 万年至 200 万年前。1924 年，在南非汤恩首次发现一个南方古猿的幼儿头骨，后来在非洲东部、南部也陆续发现了不少的南方古猿化石。1973 年 美国学者康纳德·约翰逊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个膝关节的股骨下端和胫骨上端的两端化石，与猿类已有了本质不同。1974 年，约翰逊的考古队又发现了一个生活在 325 万年前的“少女”的 40% 的骨架 他们把她命名为“露茜”。一年以后，考古队发现了至少属于 13 个与“露茜”同时代的类人猿的大量骨骼。又过了一年 英国人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发现了一个直立类人猿的足迹 这证明了人类的祖先 在 300 多万年前就已行走在东非的地面上。

南方古猿分为四个种群。以“露茜”为代表的阿法种是最古老的种群 非洲种(纤细种)虽然不很高大 却很强壮 兼食植物和肉类 粗壮种 身体结实 从牙齿来看主要以植物为食 鲍氏种 比粗壮种体型更为粗壮，下颌和牙齿很大，更适宜咀嚼植物，而不是撕咬。各种属的体型差异很大。在最矮小的种属中，发育充分的成年个体只有 120 厘米高 重不过 30 公斤。而在最高大的种属中，身量最大的成员会达到 155 厘米 70 公斤。总体来说，他们的脑容量比现代人小得多，成年南方古猿平均颅骨容量大约为 450 立方厘米 比现代黑猩猩多 65 立方厘米，比现代人少近 1 000 立方厘米。南方古猿的脑结构已经比较复杂，可能具备简单的语言能力。他们的门齿和犬齿比现代猿类小得多，但犬齿比人发达，没有齿隙。拇指可以和其他

四指对握，抓握东西更有力。骨盆比现代猿类的宽，能够直立行走。上述种种与人相似的体态特征，足以说明南方古猿应该脱离了猿群，跨进了人科。如果对于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还有争论的话（一些学者认为它们只是猩猩的祖先），将南方古猿视为人类的祖先，应该是没有太大分歧的。

人猿揖别的转折点 腊玛古猿、南方古猿都应该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 亦即恩格斯所说的“正在形成中的人”。从 1 400 万年前腊玛古猿转向地面生活 到 200 万年前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出现，在这漫长的过渡期内，人和猿发生了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分裂。第一次与直立行走有关。“露茜”和她的同伴们比黑猩猩的脑容量大不了多少，他们能够直立的臂骨和腿骨使他们卓尔不群。而具有本质性改变的脑容量的增大表现在“露茜”之后 125 万年的化石上。所以，直立行走应该比大脑的变化出现得更早。

在脑容量发生质的飞跃之前，直立行走的优势并不体现在把双手解放出来使用和制造工具上。从生物学和力学角度来讲，用后腿支撑全部的身体重量走路，是难以保持平衡的，两条腿奔跑也远不如四条腿齐用的速度快。但是，这样可以用上肢抓取食物，将食物运至隐秘处享用，这远比用嘴叼着东西奔跑方便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直立行走使我们的祖先具有更长久的耐力。人可以跑 42 公里 195 米的马拉松比赛；而一头斑马在被追赶的情况下，不到 800 米就会力竭倒下。直立也可以使我们的祖先比四足动物少受到 $1/3$ 的日晒，这使他们在没有遮蔽的草原上生活得更惬意。种种迹象表明，直立使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占有极大的优势。

第二次分裂当然就是脑容量的激增。南方古猿的大脑还不足以使他们在进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经历了二三百万年之后，他们的平均脑量与身体的比例仍然保持不变，逐渐灭绝了。取而代之的，是比南方古猿脑量多 50%、能制造工具的能人。而且 人脑在生产活

动中一直保持着缓慢但却持续的增长，直到人脑比南方古猿的最大脑容量多两倍时，才稳定下来。可以肯定，正是这种大脑，使能人在 10 万到 20 万年内接过直立类人猿的接力棒，并最终成为地球上的伟大革命者。

人猿分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历史前提：人类的祖先走出森林，不得不依赖工具而生存，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制造的。科学研究表明，许多动物都会使用工具。比如，现代黑猩猩也会使用天然工具。它们会用石块砸开油棕果的硬壳，会修整出合适的小树棍伸进蚁窝里钓白蚁，但这些都只是简单、奢侈的享受，它们完全可以依靠自然的方式生存。而人类的祖先就不同了，他们要在地面上艰难觅食，要抵御猛兽侵袭，没有工具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发展、使用、制造工具的能力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讲，成为一种必须。正是在这一点上，促成了人猿的分道扬镳。正像英国学者汤因比所说：“大约 200 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为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类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能人 能人早在 200 万年前就存在了，他们是目前已知的向现代人进化的最早种属。1960 年起，在东非的奥杜威陆续发现了能人的化石，与南方古猿鲍氏种的发现地相同。能人在身材上与南方古猿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他们的脑容量却达到 800 立方厘米。手骨和足骨与现代人类似。他们能用兽骨、树枝制造工具，用砾石磨成边缘锋利的砍削工具，利用这些简单的工具来挖掘块茎、砍斫植物、砸碎坚果和切割腐肉。他们还留下了圆圈型居住地基，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手艺人”。能够制造工具，标志着人类的最终形成。借助工

具采集食物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更丰富的食品，甚至可以吃到死亡动物尸体上的肉，打打“牙祭”。虽然只是在运气好的情况下，才可以捡到被遗弃的动物尸体，但是肉类成为另一食物来源，为人体力、脑力的增加带来更有效的营养物质。

我们对能人的情况知之甚少，他们的足迹好像没有超出东非边界 可能在大约 160 万年前融入了其后继者——直立人 步入晚期猿人的行列。

按照习惯，我国的科学家们将能人及更早些时候的人类始祖归入早期猿人阶段（约 350 万—200 万年前）。之后渐次是晚期猿人（约 160 万—30 万年前）早期智人（约 25 万—4 万年前）晚期智人（约 4 万—1 万年前）人类的形成、进化、发展、完善的历程越来越明晰了。

晚期猿人 晚期猿人按照国际惯例被称为直立人，他们在大约 160 万年前到 30 万年前间独领风骚，足迹遍布欧、亚、非 在不同的环境中开拓新的生活。他们的化石最早是由荷兰解剖学家杜布瓦 1890 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发现的，那是一个具有猿的许多性状的头盖骨和一枚牙齿。1892 年，又在同一地方发现一根与现代人类似的大腿骨。杜布瓦认为头骨和大腿骨属于一个个体，生存年代距今约 80 万年，并将之定名为爪哇直立猿人。不过，一些科学家质疑直立人的存在。直到 1929 年，中国北京周口店出土了生活在约 4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以后陆续发现了约 40 个男女个体的不同部位化石、数万件石器和用火的痕迹。这一考古学上最完整、丰富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直立人的存在。还有在印尼发现的莫佐托克猿人、德国的海德堡猿人、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猿人等，都是直立人的代表。

从体质方面看 直立人与现代人身材相当 平均高 160 厘米。大脑的形状已经朝着现代人的大脑进化，脑容量达到 950 立方厘米 比

能人平均要多 40%。北京猿人的脑褶皱比爪哇猿人复杂，脑容量也稍大。在同一地点发现的距今 20 万年左右的北京人也比 40 万年前的先辈们脑容量大增，牙齿和上下颚变小。这证明直立人自身一直在缓慢而有效的进化之中。他们直立行走的姿势已经很完美，不过，在外貌上 他们还是更接近于猿 头骨扁平 骨壁厚 眶上脊粗壮 毛发浓密。猿和人的性质混合存在于他们的身体内。

因为脑容量的增加 直立人的智力有了极大的发展 生存能力提高了，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地域条件。他们应该已经可以发出现代人可以发出的大多数声音，具有某种简单的语言了。随骨骼化石一起发现的大量丰富的石器表明，他们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技术远远比先辈们熟练。他们可以制造出形体对称的梨形石斧，用来更便利地割取肉块。他们会从大石块上打下小的石片，制作刮削器。更惊人的是 他们至少在 40 万年前就学会了使用火。我们不能断定直立人已经会人工取火 但至少他们可以控制火 使用火来取暖、驱逐野兽，更重要的是用火烹调食物——煮熟的食物无疑更促进了脑的发展。如果没有火，他们不可能在较寒冷的欧洲和中国生活，人类就只能在有限的热带地区茹毛饮血。

直立人建立了一套群体捕猎野兽、加工并分配劳动果实的合作机制，特别是在采集食物和加工食物的过程中，确立了最有效的男女分工。这种基于生存需要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角色关系，已经具备了社会的雏形。他们 20—30 人一起生活，当时的全球人口估计不会超过 100 万。

早期智人 人类进化的速度在直立人时期已经越来越缓慢，以至于我们很难分清他们向智人过渡的准确阶段。大概在 30 万年前，直立人逐渐进化为原始智人。我们对生活在约 30 万年到 12.5 万年前的原始智人的情况不甚了了。他们应该有较大的脑、较薄的颅骨、很重的骨骼以及突出的前额。但是，对于活跃在 12.5 万年到 4 万年

前的尼安德特人，我们掌握的资料就比较丰富了。尼安德特人的化石 1856 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的尼安德特谷。他们在遗传学方面与现代人的区别很小，就像是不同民族的兄弟。他们彻底摒弃了祖先们像猿类那样斜坡状的前额，只是颅骨形状与现代人稍有不同，眉骨粗大些。鼻子扁平，门牙较大，便于咀嚼。胸围比现代人宽些，体型粗壮。这些体质特征使他们可以战胜当时严寒的冰川气候。

尼安德特人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化，他们具有其前辈们无法比拟的高超的工具制造技术，善于打猎。而且，他们开始追求某些神秘的物质生存之外的活动，具备了初步的礼仪。令人不解的是，盛极一时的尼安德特人在距今 4 万到 3 万年前消失了，解剖学上的完整现代人出现了。直立人在地球上存在了 100 万年以上的的时间，尼安德特人只用了 7 万年左右就到达了人类进化的终点。他们是怎样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一跨越的，至今还是个谜。

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在身高上比尼安德特人平均高不过 20 厘米 身材却极其纤细 动作敏捷 体重在 45 公斤以下。他们的眉脊减弱 颅骨增大 颌部退缩 下颌明显 其体质特征与现代人没什么太大分别。他们的化石 1868 年首先发现于法国的克罗马农洞穴，以后除南极洲外 在各大洲均有发现。

晚期智人出现的时候，现代人种也随之形成，即蒙古利亚人种（黄种）、欧罗巴人种（白种）、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种形成主要是自然环境长期影响的结果。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身体的某些部分产生了对当地特定自然条件的适应性，就形成了肤色、身材、发色等的区别。这些外貌体态的差异并不影响人类自身基本生理特点和智力的发展，因此没有人种的优劣之分。人种形成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复杂的语系。同一或邻近地区的人群之间，表达方式日趋接近，声带振动方式渐趋统一并遗传下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体系而区别

于别的地区。

人类多源论 人类的发祥地到底在哪里？人类是从非洲、欧洲还是亚洲走出来的呢？人们各执一词，西欧起源说、亚洲起源说、非洲起源说，每一种假说似乎都有证据，却也存在一些不能解释的疑点。现在，许多科学家认为人类不是简单地由某一个中心分散迁移出去的。亚、非、欧三洲都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化石和早期文化遗址，所以人类的起源应该是多源头、多线程的。而由于各区域的自然环境不同，人类的进化形成了人种之间的差异。人类的祖先在亚、非、欧各自独立地进化、发展着。因为天气、食物源等生存条件的变化，为了寻找更多更好的栖身之地，我们的祖先不断地迁徙到新大陆去。一般认为 美洲最早的居民是 4 万年前，从亚洲东北部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当时的海平面比今天低大约 100 米 白令海峡存在着干燥的陆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尚有陆路可通。亚洲大陆的猎人们为了追捕猛犸象 有可能在 4 万年前跨过陆桥来到北美，然后从阿拉斯加越过加拿大，迁居在北美平原。至于人类的祖先是怎样在 3 万年前就出现在澳洲的，科学家们也说不清楚。即使当时海平面比现在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连成一片，但仍避免不了要渡海。这些勇敢的航海者，又是怎样征服海洋的呢？

这样 在 3 万年前，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已经发育成熟，并且足迹遍布南极洲之外的各大陆。他们依靠技术和文化，迅速成为世界的主人，开始了改造自然的新征程。

第二节 石器文化

原始人类的首要任务甚至全部追求是生存，即千方百计地获取食物果腹。人类的祖先在体力上并没有太大优势，他们在进化过程

中身材变得越来越纤细。不过，脑容量的激增足以弥补身体上的劣势。智力的增长使他们可以制造出各种工具与武器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获取丰富的生活资源。生存的需要，对食物的渴望都凝固在他们制作的器具中。简单质朴的原始器物，是人类文化的初萌。

原始人就地取材，主要是以石头来制作工具，所以考古学家把这一漫长的阶段称为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基本涵盖了原始社会的基本风貌，又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三个阶段。时间较长的旧石器时代又可细分为早、中、晚三段。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早期大致是早期猿人和晚期猿人的时候。当时人类主要以天然食物为生，比如果实、树根等，偶尔能捡到的动物残尸上的生肉。他们使用天然工具，如一块石头或者一截树棒笨拙地挖掘树根 撕扯肉类。1969 年在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发现了 261 万年前的石器。这种工具只是用砾石粗糙加工而成，没有固定形状，不过远比天然工具顺手多了。

到晚期猿人时期，石器的制作工艺有了巨大的进步。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的舍利文化中出现的手斧。手斧的样子呈扁桃形或椭圆形，一端尖锐，一端钝厚，使用时用手握住钝面。舍利文化之后的阿舍利文化时期的手斧，更加小巧、精致，口刃更锋利。手斧可以用来挖掘块根、切削东西、砍砸野兽。这种用途广泛的“万能工具”，从 150 万年前到 10 万年前 始终是欧、亚、非地区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同时，各种刮削器、砍砸器和石片依然流行。在中国甚至还发现了用作投掷的石球，这是防身、狩猎的武器，后来发展成为威力巨大的飞石索。

直立人的另一伟大成就是火的使用。人类最早的用火遗迹发现于非洲肯尼亚的切萨瓦尼亚地区，有 40 块烧过的黏土小碎块，应该是 142 万年前的篝火烧成的。人们在法国马赛附近的埃斯卡尔洞穴发现了 75 万年前的木炭和灰烬。在北京猿人的遗址中，有厚达